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4.008

论《拉维尔斯坦》的艾滋叙事 与当代芝加哥知识分子品格

胡碧媛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索尔·贝娄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以艾滋叙事的方式回忆生前好友、知名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教授的学术人生,学术界对此的争议在于文学叙事的伦理选择。贝娄借用艾滋叙事的隐喻方式书写文学人物所再现的当代芝加哥知识分子品格,在后现代的“文化战”中反映对生命政治的人文理解,并且以亚里士多德式的品格呈现贝娄式虚构叙事的修辞术。

关键词: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艾滋叙事;芝加哥知识分子品格;“文化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4-0058-06

索尔·贝娄于84岁高龄出版生前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旋即登上《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排行榜,媒体蹿红的热度在学术界引起一片哗然,争议集中于艾滋叙事的问题。小说主人公拉维尔斯坦的原型被公认为是贝娄的好友,曾共同就职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教授,因抨击“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①的高等教育,出版《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而声名大噪,1992年逝于艾滋并发症。布鲁姆教授的遗愿之一是拜托贝娄为之写传记,而成文的《拉维尔斯坦》是以虚构文本呈现的艾滋抗疫回忆录,俨然解构了名人光环以及尊重逝者的人文伦理,甚至引发正义、自由主义、知识共同体等一系列争议。有评论家认为贝娄“对布鲁姆的描绘是给他的老朋友帮倒忙”,“贝娄实在不该这样‘抖落’布鲁姆的私事”^②,更有甚者指责贝娄“有意将布鲁姆树立为权威榜样,继而将他们

的关系列为友情的典范”^③。

评论界亦有类似詹姆斯·伍德这样不以为然的,认为贝娄不过就是延续了《赫索格》《洪堡的礼物》等小说创作的一贯套路,酷爱取材亲朋好友包括自己的经历,如实再现美丑善恶以呈现人性魅力从而创造“威严的趣味”^④。尽管在该部小说中,贝娄借用人物之口提出“用什么方法来写传记成为一个难题”^⑤,但这虚晃一枪的落脚点在于“过分强调文字上的真实,限制了对于写作本身更为广泛的兴趣”^⑥。伍德认为《拉维尔斯坦》的创作“消散了传记的尘埃,坚持自主性”,学者卡库塔尼则认为这更像是“虚构的肖像画”^⑦,而《拉维尔斯坦》前半部分仅记叙拉氏罹患艾滋到去世这段生命经历,后半段则记叙有关拉氏挚友齐克本人的濒死体验,充其量也就是回忆录小说,谈不上什么传记写作。学界重拾贝娄虚实结合的

收稿日期:2023-04-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WWB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社科成果培育项目(B220207014)

作者简介:胡碧媛(1971—),女,江苏南京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研究。

①索尔·贝娄:《序》,载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②Stephen M. “*Ravelstein* by Saul Bellow”, *The Guardian*, 11 May, 2000. 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0/may/11/saulbellow#maincontent.

③John U. “The Rage Over *Ravelste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000, 24 (2): 455.

④James W. “The Worldly Mystic’s Late Bloom”, *The Guardian*, 15 April, 2000. 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0/apr/15/fiction.

⑤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⑥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⑦Michiko K. “*Ravelstein*: Bellow Plays Boswell to a Most Extravagant Johnson”,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library/books/042000bellow-book-review.html>.

叙事风格,其背后隐藏的焦点恐怕是如何再现艾滋的问题。

德里达将艾滋界定为“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所面临的最具揭示……最末世的事件之一”^①,有学者据此指出,“艾滋综合症揭示的是不可揭示性:它揭开了秘密,进而模糊并干涉了解的进程”^②。作为后现代文化现象的艾滋问题,一旦进入文本空间,叙事的焦点无论从主题的反映、人物的塑造以及再现方式的选择上都具备了诸多含混性。那么,贝娄的这部终结性作品是否以疾病叙事的手段对小说人物的功能进行总结和反思?其人物再现的表征是指向主题内涵或是为叙事服务?应该说,贝娄借用艾滋叙事的隐喻方式书写拉维尔斯坦事件所折射的当代芝加哥知识分子风貌,在后现代的“文化战”中反映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生命政治思考,并且以亚里士多德式的品格诉诸呈现贝娄式虚构叙事的修辞术。

一 快感与痛感的身体叙事

在小说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拉维尔斯坦被塑造为地位卓群的精英形象,他知识渊博,成果卓著,拥有广泛的社交圈及影响力,“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③。伍德认为“贝娄时常书写知识分子,因此他笔下的人物精神世界充沛(all mind),身体形象丰满(all body),这多少有点悖论”^④。伍德的评价可谓意味深长,双关修辞 all body 将贝娄对知识人物的再现落实于物质主义的身体话语,与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思想性产生对比效果。

因为感染艾滋病,拉维尔斯坦的身体显然出了大问题。在美国,艾滋病的最早病例发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大城市的男同性恋人群中。医学界公开确认最初病例之前,当时纽约唯一的同性恋报纸《纽约本地人》,就于 1981 年报道了男同性恋群体中所谓“男同癌症”的传言,并要求美国疾控中心出面予以否认^⑤。性传播是医学界达成共

识的艾滋病传染渠道之一,其传播之隐秘、蔓延速度之快一直是医学界的难题,其不可治愈性和流行病学特征持续引发民众广泛的恐惧心理。前现代期因医疗技术的欠缺,使社会形成有关疾病、特别是大范围流行瘟疫意味着上帝天谴的固有观念,而艾滋病与性行为习惯相关的传播性更是强化了这一疾病的道德罪恶感,使患者本人遭受诸如道德败坏的非议与指责。

按照医学伦理及职业规范,患者的病情是个人隐私,应严格处于保密的状态,而患者更是对罹患艾滋病讳莫如深。小说的叙事仿佛对此全然无所顾忌,不仅和盘托出病况,且丝毫不掩饰病态的欲望高涨。因艾滋病所造成身体功能的异常,“性兴奋持续不退”^⑥。耽于肉体快感的被动经验,与拉维尔斯坦一向奉行的享乐主义原则却不谋而合,他大笔挥霍表达对奢侈品的钟爱,“那些阿玛尼的西装,威登的箱包,美国搞不到的古巴雪茄,登喜路的配饰,纯金的万宝龙金笔,还有巴卡拉或拉利克的水晶玻璃器皿”^⑦。拉维尔斯坦还有一位名为尼基的亚裔同性伴侣,“不知怎么是被宠坏了”,尽管拉维尔斯坦声称“他们之间……更多像父子关系”^⑧,缠绵于病榻的拉维尔斯坦都不忘定制宝马跑车取悦尼基,更加深了一种欲望滥觞的罪错感,加上男同群体与艾滋病的文化渊源与社会歧视性,这种追求感性生活的欲望体验,会使读者对于拉维尔斯坦本人产生德行质疑,甚至会迁移至以理性与智性为常规标签的知识分子群体。

从词源来说,患者的英文表达“patient”源自拉丁词“pati”,意思是受苦受难。无论是身体的痛苦或是精神耻辱带来的折磨,艾滋病患者都是毫无疑问的受难者。艾滋病的医学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发病机理在于病毒导致免疫力低下,使患者完全丧失对外界的抵抗能力,不得不被动接受各种微生物的“入侵”^⑨。“他受到一系列的感染。带状疱疹整得很苦”,紧接着

① Jacques D. “The Rhetoric of Drugs: An Interview”, trans. Michael I,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1993, 5 (1): 5-6.

② Andrew B. “‘The Past Is Not a Foreign Country’: John Weir’s AIDS Fiction”,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2017, 44 (1): 145.

③ 索尔·贝娄:《序》,载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 页。

④ James W. “The Worldly Mystic’s Late Bloom”, *The Guardian*, 15 April, 2000. 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0/apr/15/fiction.

⑤ Lawrence M. “Disease Rumors Largely Unfounded”, *New York Native*, 18 May, 1981.

⑥ 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2 页。

⑦ 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⑧ 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7 页。

⑨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4 页。

的“下一个感染被神经病学家称为格巴二氏综合征”^①。包括密友齐克在内,拉维尔斯坦身边的人 都目睹了他所经历的肉体痛苦,然而拉氏的积极心态与精神昂扬显示了他一贯的生活态度。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辞术》中提出辩论术的三种模式:情感诉诸(pathos)、品格诉诸(ethos)与逻辑诉诸(logos)。其中,品格诉诸的核心在于以辩论者的人格品质作为论证的基础与保障,以确立辩论者的权威性与影响力,由此提供了品格魅力与影响力之逻辑关系的观察视角。而关于品格的内涵及培养方式,亚里士多德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以“德行”说进行阐释,包括勇气、慷慨、大方、温和、友善、公正等等,但亚里士多德的“德行”观更“是一个关乎快感与痛感的中道”^②,必须经历快感以及相辅相成的痛感的双重体验。艾滋病毒的攻击在于其“污染”被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因而被感染者不得不永远处在脆弱之中^③。对艾滋病患者而言,痛感是绵延不绝的身体磨难与精神脆弱。在拉维尔斯坦这里,痛感被改写为享受生活的快感和昂扬的生活意志,反映亚氏德行论的首要品质:勇气,尤其是面对死亡时的勇气。“他活着的最后一个月里,拉维尔斯坦和往常一样地工作”^④，“在思考这最后的日子 里必须思考的问题”，“他企图在最后的时刻干完所有能够干的事情”^⑤。

贝娄与艾伦·布鲁姆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共同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并成为密友,那时的芝大吸引了一批知名的作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等主流学者,处于学术影响最为旺盛的时期。在贝娄看来,“芝加哥吸引着不规矩的人,大部分都是著名学者,有着有趣的怪癖和个人历史”^⑥。贝娄毕生的小说创作大多反映芝加哥知识分子风貌,运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将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人物书写为兼具恶习的复杂结合,以此作为探讨艺术功能、商业生活及小说功能的叙事手

段。同时,贝娄对于人物之“魂”的理解需要展现面对死亡的“个人与文化品质”^⑦。贝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往往以鲜明的悖论性而呈现人性的多样维度,卡库塔尼在《纽约时报》书评中称为“具有超凡魅力的拉维尔斯坦”(charismatic Ravelstein)也不例外,例如他热爱古典哲学却醉心于消费的盛宴,倡导知识理性却不排斥感性生活,奉行犹太人的正统本质却实践着同性恋的逾越之举,身为精英却漠视权威,挑战主流文化标准^⑧。贝娄写实地再现拉氏的品格魅力,尤其是在艾滋病文化战之中面对死亡的生命意志,呈现具有伦理价值意义的人物之“魂”,从而得以实践品格诉诸。

二 品格影响力的见证叙事

贝娄与布鲁姆多年的密友关系建立了彼此之间无话不谈的信任,他不仅参与了布鲁姆的人生经历,而且在小说中也以齐克的身份继续观察拉维尔斯坦的人生。从事医学与文学叙事研究的美国知名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术期刊《文学与医学》前主编丽塔·查兰博士,着重从医患关系的交流方式分析身体话语如何参与伦理身份建构。患者的隐私诉求是医学伦理的重要关注点,患者在叙述病情时不得不揭示自我,向医护人员同时也是陌生人吐露秘密,“揭开了通常隐藏在现象之后的事实面纱”^⑨。疾病特别是绝症所带来的身体痛苦与精神折磨,迫使患者急需在心理层面获得释放,患者从最初的被迫叙述者转换为“需要”倾吐压力,治疗身体疾病的手段也需要结合心理疏导。医护人员是在患者身体和精神双重混乱时进入患者的生活,“再现的是他或她所见证的事实”^⑩。

《拉维尔斯坦》的文学叙事手段,由于疾病主题的介入而获得了医学伦理的见证式特征。虽然齐克并非拉维尔斯坦的主治医生,但由于两者的密友关系,齐克甚至更为了解拉维尔斯坦的病情、

①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②唐热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③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④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⑤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⑥James W. “The Worldly Mystic’s Late Bloom”, *The Guardian*, 15 April, 2000. 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0/apr/15/fiction

⑦Willis S. “Saul Bellow on the Soul: Character and the Spirit of Culture in *Humboldt’s Gift* and *Ravelstein*”,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2016, 14 (1): 128-129.

⑧祝平:《悖论的迷宫——评索尔·贝娄的〈拉维尔斯坦〉》,《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1期。

⑨Rita C. “The Novelization of the Body, or, How Medicine and Stories Need One Another”, *Narrative*, 2011, 19 (1): 36.

⑩Rita C. “Narrative Medicine: Attention, Representation, Affiliation”, *Narrative*, 2005, 13 (3): 265.

隐私、秘密、为人及应对疾病的行为方式,作为病患的拉氏在齐克面前更愿意表现真实的自我。齐克见证了拉氏因疾病打击导致的身体脆弱性,还有他始终如一的各种癖好,“他喜欢无伤大雅的罪行和有失检点的举止”^①,然而,“他没有病人的郁郁寡欢或情绪消沉”^②,“乐意将什么都摊开来告诉我”^③。

处于观察地位的见证者也是具有主体性的个体,观察以一种视觉经验介入与被观察对象的互动,“隐私的世界简单重叠成为可见的表象”^④,病人倾吐隐私的过程借由观者与观察对象的主体间性,对观察者的私密世界产生启发与共鸣作用。如齐克所言,“能够观看是一种特权——观看,触摸,倾听”^⑤。贝娄的叙事以亲密关系的情感化交流为基础,从而将医患之间的信任建立过程,书写为见证者与见证对象的同一性发展进阶。齐克本人是心脏病患者,陪伴病重的拉维尔斯坦成为齐克“有生以来的好时光”,齐克也“可以自由地向拉维尔斯坦供认我不能对别人说的事情”^⑥。齐克与拉氏之间观察与被观察、见证与参与的角色不断互换、重组、交织、重叠,使得齐克感受到互为对象、互为主体的经验性,“将自己任由他者处置,让他者通过我们谈话或是使用腹语术,寻找难以言说之语的表达词汇”^⑦,“被再现的源自所看、所体验与感知,而不是纯粹的创造”^⑧。这种见证式的叙事,既赋予作者贝娄以文学人物身份进入小说参与事件进程的优越性,又能以作者身份利用全知视野与读者一起见证小说进程,写作的过程与文本情景交融,所谓真实与虚构的内容成为服务于叙事的技巧。

在希腊语的词源上,ethos 一词指的是“惯常聚集地”(a habitual gathering place),是人们聚会

社交沟通交流的场所,意指在公共场所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从而培养并展现具有德行的公众“品格”^⑨。因此,亚里士多德“品格”论具有参与公众生活的内涵,而品格的展现也最终需要经由公共生活的运作得以实现。就交往关系的导向而言,作为病患的拉氏与见证者齐克之间打破了常规模式。非但不需要别人的引领与疏导,拉氏在疾病的状态中表现出更为主动的影响力。他倡导社会生活的高参与度,倡导社会个体以积极心态向公共空间开放。“拉维尔斯坦催促齐克把兴趣放到‘公众生活与政治’”^⑩,“他以为我太沉湎于自己的幽然独处,应该回归社会”^⑪。

品格向公共空间延展的特性,有助于审视品格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双重维度。亚式的品格论既表示个人的习得教养与品行德行,也可以代表某种职业,某个群体,甚至某种文化模式或是历史分期的德行伦理^⑫。拉维尔斯坦是医学翘楚施莱医生的病人,但在治疗方案的安排上更展现自我的主动选择。拉氏的做法尽管有悖于施莱的职业要求,对拉氏的品格敬仰打破了施莱对于规范与标准的固守,形成共情认知,“他把拉维尔斯坦看作一场文化和意识形态战争中的伟大斗士”^⑬,原本单纯的医患关系,在贝娄品格诉诸式的疾病叙事中,延伸为芝加哥知识分子群体风范的讨论。在拉氏患病期间,他不仅保持着与齐克进行各种哲学、政治学等话题探讨交流的习惯,还乐于作为倾听者安抚患有严重心脏病且有自杀倾向的知识分子圈内人。如伍德所言,《拉维尔斯坦》“纪念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知识分子群体”,贝娄将拉氏的个性再现书写为芝加哥知识分子的品格取向,书写一群生命中也会肤浅简单、也会遭遇一地鸡毛的知识精英,依然努力在世俗的日常中发现生

①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②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③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④Rita C. “The Novelization of the Body, or, How Medicine and Stories Need One Another”, *Narrative*, 2011, 19 (1): 36.

⑤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⑥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⑦Rita C. “Narrative Medicine: Attention, Representation, Affiliation”, *Narrative*, 2005, 13 (3): 263.

⑧Rita C. “Narrative Medicine: Attention, Representation, Affiliation”, *Narrative*, 2005, 13 (3): 266.

⑨本文对于ethos的译法参考了Michael Halloran在Aristotle's Concept of Ethos, or If Not His Somebody Else's一文中的阐释与界定。他认为ethos特别强调参与公共生活的习惯,讲求长期的养成从而呈现个人习得的character而非客观定位的personality。参见Michael H. “Aristotle's Concept of Ethos, or If Not His Somebody Else's”, *Rhetoric Review*, 1982, 1 (1): 60-61.

⑩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⑪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⑫Michael H. “Aristotle's Concept of Ethos, or If Not His Somebody Else's”, *Rhetoric Review*, 1982, 1 (1): 62.

⑬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命的本真。

三 自我超越的时空叙事

学者威利斯·赛罗门撰文对比研究《洪堡的礼物》与《拉维尔斯坦》中品格的塑造与文化精神的关系,认为《拉维尔斯坦》是一部“关于努力超越的挽歌式小说”,“他的深度精神生活与放纵的欲望,在追求超越性的柏拉图式真理中达到平衡”^①。他同时指出,“贝娄的小说空间在结构和主题上都以情感观察为基础。对贝娄而言,情感指代伦理选择,指向精力充沛的焦点人物,为观察者也为他者树立品格标准”^②。赛罗门的研究揭示了贝娄笔下拉氏的品格精神与文化影响力,也为深受拉氏影响的齐克重构自我认知,续写知识分子品格提供了研究的立论依据。齐克的见证叙事在细察拉维尔斯坦人品的同时,对自我的构建进行了有效参照,在拉氏辞世以后,齐克以身体经验的行动实践,尝试重构式的自我超越。

按照桑塔格的论述,人类总是将对瘟疫的想象与异邦建构关系,隐喻邪恶、非我、异族等内涵^③。艾滋病的地理溯源指向非洲,这难免将疾病的恐惧转移至种族主义论调,以及有关原始性与性放纵之间的关联。此外,艾滋病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世界保守势力复兴的时期,就美国而言正值里根总统任期开始。出于人道主义的信仰,教会认为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而政治圈中的保守势力则猛烈抨击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艾滋病使得70年代的“同性恋革命”与80年代里根政府的主张针锋相对。保守派认为散发免费保险套与里根政府遏制通胀的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甚至认为这一举措本质威胁的是信仰问题。此外,里根政府在1987年起开始实施旅行禁令,禁止国外艾滋病毒阳性携带者进入美国,1993年克林顿执政时国会正式将这一禁令立法,直到2009年才取消^④。关于艾滋病所掀起的文化战及政治风

波,贝娄在《拉维尔斯坦》的叙事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但是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贝娄不可能完全回避相关的讨论,他在叙事中选择美国式的他者——具有殖民历史与异族文化特色的加勒比海地区作为反思生命政治的语境。

与世界的接触交流作为身体经验的先验方式,拉氏与齐克都有着充分的表现与实践,而身体经验所依赖的处境性,也将齐克召唤至艾滋病所隐喻的异邦文化境遇之中,思考身体的存在和身体的超越之间的矛盾与张力。齐克将加勒比的度假胜地描绘为“一个巨大的热带贫民窟……很多大赌场,老大的气味难闻的礁湖,又黑又浑浊”^⑤。视觉化的感官体验带给身体被动化的印象,这种当下的意象往往具有向过去和未来的延伸性,使得身体主体获得敏锐的时间意识。置身于这个充斥着“烤肉冒出来的浓烟”,抓着鲜活的大龙虾“招徕顾客的人,堕落的人”的热带天堂^⑥,齐克想到的是拉维尔斯坦“所有的天赋,他的无穷无尽的乐趣,他的完全静止的智慧”^⑦，“总是意识到拉维尔斯坦的影响”^⑧。

艾滋病是逐步发展的,原本就是一种时间性的疾病,患病之后的身体经验使得患者更为聚焦于当下的存在,拉维尔斯坦曾这样对齐克倾诉,“你真愿意时间过得慢一些,就像孩童时期一样——每天都像过一辈子”^⑨。在与拉氏的交往之中,齐克感知到三个维度的身体经验:“自然性的偶然存在,在他人目光中作为对象而存在,以及我借助于他人目光而自身反思地存在。”^⑩齐克选择加勒比海这个充满政治隐喻的空间作为拉氏辞世之后自我反思之处,感知拉氏的影响与“品格力量”,意在将拉氏的政治人生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经验,从而得以探讨历史与时间的终极命题。

齐克的自反性莫过于在加勒比的生死体验。齐克误食热带鱼中毒,严重损害到神经系统,

① Willis S. “Saul Bellow on the Soul: Character and the Spirit of Culture in *Humboldt's Gift* and *Ravelstein*”,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2016, 14 (1): 139.

② Willis S. “Saul Bellow on the Soul: Character and the Spirit of Culture in *Humboldt's Gift* and *Ravelstein*”,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2016, 14 (1): 167.

③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④ Victoria H. *Aids at 30: A History*.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2, p. 106.

⑤ 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75页。

⑥ 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⑦ 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⑧ 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⑨ 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⑩ 杨大春:《身体的神秘:法国现象学的一个独特维度》,《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

更由于延误了治疗,在后期发展到心肺衰竭的严重地步,“我曾经到不同医院的加护病房,探望过拉维尔斯坦和其他的亲戚朋友……偶尔我竟然想过,有那么一天,被绑在这里,连接着维持生命机器的也许是我。然而我现在就是那个要死的人”^①。身体感觉的灵性化使得齐克聚焦于时间感知^②,齐格在重病之后出现各种幻觉,表现为各种回忆,也就是对过去时间的感知重新回到意识中来。这种幻觉总是交织着对死亡的处理与思考,包括曾经与前妻讨论死后在银行冷冻身体,包括在幻觉中有种“得到解放”的轻松。齐克在幻觉中获得了三维合一的时间意识,即在当下的处境之中,由于身体经验的指引获得过去的意识,然而过去的时间内涵指向的是未来的终结。热带对持有政治保守观念的齐克意味着“死亡威胁”,但是却在此“重新建立和死者的关系,一个能够承受的尽可能诚实的评价——反省一生的行为、爱好、感情”^③。美国学者凡·伦斯勒·波特根据自己作为肿瘤医生的从医经历,提出了生命伦理的

五大信条,最后的第五条里将他所倡导的生命伦理核心原则进行了概况总结,“肯定我们生物及社会性的存在,接受我们失控的身体状况,重视公共生活,对未来怀有责任与希望”^④,于此也反映贝娄的艾滋叙事对知识分子品格的理解。

结语

贝娄在给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的信中,谈及《拉维尔斯坦》所引起的争议时写道,“如果漠视拉维尔斯坦的品格魅力,我将无法面对我自己”^⑤。贝娄利用真实与虚构的叙事张力,在他的终结性作品中绘制知识分子品格,从个体上升到群体最终落实于自我的审视与重构,在艾滋病所隐喻的末世情结中书写生命的希望。贝娄的疾病书写“对现代人的精神和心理病症的解剖,不仅进一步思考伦理关系,而且使社会情感关系复杂化,从而彰显作品的思想内涵以及对现实的穿透力和批判”^⑥,在后现代的文化喧嚣中延续了现代性的意义坚持。

AIDS Narrative and Ethos of Contemporary Chicago Intellectual in *Ravelstein*

HU Bi-yua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Ravelstein*, Saul Bellow's last novel, is written in AIDS narrative as a reminiscence of Allan Bloom, his lifetime friend and a professor of politics and philosopher. The controversy in academic field about this novel centers around an ethical choice in a truthful or fictionalized narrative. In fact, Bellow adopts the metaphor of AIDS narrative to represent a Chicago intellectual ethos through the embodiment of characters. In this way, he presents a humanistic understanding towards life politics against postmodern “cultural wars”, and a Bellowian rhetoric of fictionalized narrative with Aristotle's ethos appeal.

Key words: Saul Bellow; *Ravelstein*; AIDS narrative; Chicago intellectual ethos; “cultural wars”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②法国现象学打破身心二元对立的哲学观提出现象身体的概念,将身体上升至主体的位置,以身心合一的主体经验决定人的存在。梅洛-庞蒂的理论更为突出表达了身体中心的存在观,同时并不排斥身体的处境性、可逆性为表征的身体间性。参见杨大春:《从身体现象学到泛身体哲学》,《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杨大春:《身体的神秘:法国现象学的一个独特维度》,《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季晓峰:《论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东南学术》2010年第2期;欧阳灿灿:《身体如何成为存在的根基——梅洛-庞蒂论身体与外在事物的关系》,《外国文学》2018年第3期。

③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④Jenell J. “Bioethics as a Way of Life: The Radical Bioethics of Van Rensselaer Potter”,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2016, 34 (1): 18.

⑤Benjamin T, ed. *Letter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0, p. 639.

⑥杨金才:《关于21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